

目錄

關於「文藝報」的決議	三點建議	良好的開端	我們必須戰鬪	熱烈地、誠懇地歡迎對「文藝報」進行嚴厲的批評	「文藝報」刊載「紅樓夢研究」介紹文所犯的錯誤	紅樓夢並不是夢	賈寶玉的典型意義	紅樓夢的現實主義成就	「紅樓夢」是屬於人民的	試論林黛玉和薛寶釵的思想性格	談談賈寶玉
周揚(三〇)	鍾敬文(五九)	老舍(六九)	白盾(七五)	林冬平(一〇二)	許之喬(一一七)	俞冬(一三四)	谷峪(一四三)				

從俞平伯先生對「紅樓夢」的研究談到考據……	王 瑤（一四八）
論釵黛合一論的思想根源……	聶紺弩（一六六）
我在這次「紅樓夢研究」的討論中所聯想到的和體會到的……	黃葉眠（一八一）
俞平伯「紅樓夢研究」是反愛國主義的……	范 寧（一九一）
從「紅樓夢辨」到「紅樓夢簡論」……	嚴敦易（一九八）
評近年來關於紅樓夢研究中的錯誤觀點……	胡念貽（二一二）
俞平伯研究紅樓夢的錯誤的又一根源……	張肅虎（二三五）
從對俞平伯先生研究「紅樓夢」的批判談起……	劉衍文（二四五）
俞平伯的錯誤文藝思想的一貫性……	蕭 山（二五三）

關於「文藝報」的決議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八日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主席團、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擴大聯席會議通過）

一九五四年十月二十八日的「人民日報」對「文藝報」在「紅樓夢」研究問題上的論中所採取的錯誤態度，進行了嚴厲的批評。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主席團和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從十月三十一日起聯合召開了幾次擴大會議，檢查了「文藝報」的工作。在會議上，文藝界的許多同志進一步揭發了「文藝報」在思想上和作風上的許多錯誤。這些錯誤主要是：對於文藝上的資產階級錯誤思想的容忍和投降；對於馬克思主義新生力量的輕視和壓制；在文藝批評上的粗暴、武斷和壓制自由討論的惡劣作風。這些錯誤的性質是嚴重的，是違背了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和黨的文藝方針的。

俞平伯所著的「紅樓夢研究」和他近年來所發表的一些關於「紅樓夢」的文章，是宣傳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觀點的錯誤著作。這些著作對我國古典文學作了嚴重的歪曲，在群眾中間散佈了毒素。對於這些著作，「文藝報」不僅沒有加以批評，反而在該刊一九五三年第九期上發表了推荐「紅樓夢研究」的文章；而在這前後，「文藝報」編

輯部對於白盾、李希凡、藍翎等用馬克思主義觀點批評俞平伯錯誤論點的文章，則拒絕刊登或不加理睬。直到李希凡、藍翎的文章在「文史哲」雜誌上發表後，由於讀者的建議，才在該刊轉載。轉載時，編者又加上了貶抑這個批評的重大意義的錯誤接語。這些事實，說明了「文藝報」在「紅樓夢」問題上所犯的錯誤決不是偶然的。「文藝報」編者們忘記了「文藝報」是一個宣傳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的刊物，它有責任去同一切反馬克思主義的錯誤的文藝思想進行鬥爭，相反地，却甘心拜倒在資產階級思想前面，甘心去頌揚和袒護反馬克思主義的文藝思想。這是不可容忍的。

「文藝報」編者既然成了資產階級思想的俘虜，就必然會和馬克思主義的新生力量疏遠起來，以至於對他們採取資產階級貴族老爺式的輕視和壓制態度。「文藝報」對待青年作家和批評家的態度是傲慢的，缺乏熱情的。「文藝報」編輯部在這次檢查工作中，發現過去退回的稿件有不少是不該退回的。這些稿子被退回的理由，往往是因為它們批評了某一個「權威」或大名人，而那些寫稿者則是「小人物」。因此，「文藝報」上刊登的青年作家和批評家的作品和讀者來稿越來越少。對於一些為群眾所歡迎的、帶有新生氣息的青年作家的作品，「文藝報」很少給予熱情的鼓勵和支持；在批評這些作品時，常常忽視了這些作品的總的傾向，却動輒用簡單的方法和粗暴的態度去挑剔缺點，輕率地否定別人的勞動成果。「文藝報」對白盾、李希凡、藍翎的態度和今年一月

間對李準的小說「不能走那一條路」所採取的冷酷的批評態度，就是最突出的例子。

「文藝報」一方面向資產階級錯誤思想投降，另一方面對於具有進步傾向的文藝作品的批評，又往往採取了粗暴、武斷和壓制自由討論的態度。「文藝報」在批評工作上，長期以來存在一種自以為是的「權威」思想和否定一切的虛無主義觀點，既缺乏實事求是的精神，又缺乏與人為善的同志態度，常常用教條主義的簡單公式去批評一篇作品，卻不容許別人進行反批評。對於那些基本傾向正確而尚有缺點的作品，不是在熱情鼓勵下幫助作者克服缺點，而是用吹毛求疵的老爺式的挑剔加以打擊。這種粗暴的、武斷的批評已給文藝創作帶來極大的損害。「文藝報」也曾經宣傳過不少錯誤的理論（如「無衝突論」等），但他們卻從來沒有對自己發表過和宣傳過的錯誤理論加以批評和糾正。文藝界和讀者早已對「文藝報」有意見，但「文藝報」編者們却不正視自己的錯誤，不重視別人對自己錯誤的批評，而是採取拒絕批評的態度。他們以為祇有他們有批評別人的權利，卻沒有傾聽別人批評的義務。他們錯誤地以為對自己的缺點和錯誤公開進行自我批評或接受批評，會有損於刊物的「威信」。這種自以為是的「權威」態度，堵塞了文藝工作上批評和自我批評的空氣，阻礙了文藝界自由討論的健全展開，使「文藝報」喪失了思想鬥爭的積極組織者的作用，而成為脫離群眾的高高在上的官僚主義的刊物了。

「文藝報」曾經設立過編輯委員會，但許多編輯委員沒有能發揮作用，主編對他們缺乏應有的尊重，許多重大問題不和編輯委員們商量，重要稿件也不給編輯委員們看，使編輯委員會成了形同虛設的東西。後來就由主編提議乾脆取消編委會了。

上述一切事實，表明「文藝報」違背了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和黨的文藝方針，違背了集體領導和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原則。近一年來，「文藝報」所宣傳的思想和所採取的做法，有不少是同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會決議的精神相違背的。

中國文聯主席團和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認為：「文藝報」所以產生這些錯誤，是由於在「文藝報」的編者們身上嚴重地存在着資產階級의思想和資產階級的作風。這是「文藝報」一切錯誤的主要根源。正是這種資產階級思想和資產階級作風，使「文藝報」編者樂於去祖護反馬克思主義的文藝思想和資產階級名人，却經常用貴族老爺式的態度抹殺和壓制馬克思主義的新生力量。

應該指出：「文藝報」自創刊以來，是做了不少有益於人民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績的。但是，「文藝報」編者却把那些成績看成是他們個人的東西，因此，滋長了一種極端驕傲自滿的情緒和腐朽的「權威」思想，這就使「文藝報」更加脫離實際，脫離群眾，而群眾對「文藝報」的不滿也越來越大了。

「文藝報」所犯的錯誤，是和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對於文藝思想領導的軟弱無力

和對人民事業缺乏責任心分不開的。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接受中國文聯的委託領導「文藝報」的工作，却放棄了自己應有的責任，沒有經常地認真地去檢查「文藝報」的工作，以至未能及時糾正「文藝報」的錯誤。文學藝術的領導機關大多忙於瑣細的事務，很少去研究文藝界存在的思想傾向問題，沒有從一九五一年對反動影片「武訓傳」的批判中認真汲取教訓。對資產階級思想的容忍和投降的錯誤傾向，在中國文聯主席團和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的工作中以及它們所領導的其他刊物和機關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中國文聯主席團和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在檢查「文藝報」的工作以後，必須進一步來檢查和改進其本身的領導工作；同時號召全國文藝團體和文藝刊物進行同樣的檢查並改進工作。

中國文聯主席團和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指出：「文藝報」應該經過這次檢查，認真地徹底地改正自己的錯誤。「文藝報」應該成為真正宣傳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開展健康的有原則性的文藝批評的刊物。它應該對資產階級的各種錯誤的文藝思想進行鬥爭，堅決克服投降主義的傾向；它應該積極扶植馬克思主義的新生力量，堅決克服輕視和壓制新生力量的傾向；它應該有領導地有計劃地開展文藝思想的自由討論。同時，其他文藝刊物也應該以同樣精神來開展文藝批評和自由討論，保證文學藝術事業能够在馬克思主義思想指導下健康地發展，真正担負起為國家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服務的光榮任務。

中國文聯主席團和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聯席會議決議：

一、改組「文藝報」的編輯機構，重新成立編輯委員會，實施集體領導的原則。

二、責成「文藝報」新的編輯委員會提出辦法，堅決克服本決議所指出的錯誤，端正刊物的編輯方針，使「文藝報」成為具有明確戰鬥方向和切實作風的刊物，內容應以文藝批評為主，同時對人民的文化藝術生活發表評論和介紹，力求擴大和密切文藝與廣大人民生活的聯系。

三、中國文聯主席團責成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改進對「文藝報」的領導工作。「文藝報」在工作上應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建立密切的聯系。

四、責成「人民文學」及中國作家協會領導的其他刊物及其地方分會的刊物加強文藝批評工作，並提出開展文藝批評和自由討論的具體計劃。

五、責成中國作家協會、中國戲劇家協會、中國音樂家協會、中國美術家協會和所屬各地分會的機關刊物以及各省市文聯所屬機關刊物的編輯機構根據本決議的方針進行工作的檢查並改進工作。

六、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應在一九五五年春季召開中國作家協會第二次理事會，來討論改進作家協會的領導工作。

（原載人民日報）

三 點 建 議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八日在中國文學藝術界
聯合會主席團、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擴大聯席
會議上的發言

郭沫若

(一)

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討論開了八次大會，足足討論了四個整天。我們批評了俞平伯先生的研究「紅樓夢」的方法，也檢查了「文藝報」的編輯工作，發言的人很踴躍，很有準備，一般地都做到了暢所欲言的地步。特別是剛才周揚同志的發言，我認為是具有總結性的。他的見解很全面，很具體，很正確，理直氣壯，很有力量，我完全同意。這一次的討論是富有教育意義的，是馬克思主義對資產階級唯心論的嚴重的思想鬥爭，是思想改造的自我教育的繼續開展，是適應當前國家過渡時期總任務的文化動員。

俞平伯先生在三十年前要用資產階級唯心論的方法來研究「紅樓夢」，本來是不足

怪的事情。三十年前，像我們這樣年輩而研究古典文學的人們，懂得馬克思主義的，真要算是鳳毛麟角了。俞平伯先生的研究之所以成爲了問題的，是他三十年來，特別是自解放以來，在思想、立場和方法上，都沒有什麼改變。這種情況特別突出地表現在俞平伯先生對王佩璋的文章的刪改上。那表露了俞平伯先生不僅沒有擺脫資產階級唯心論的影響，而且還有濃厚的封建思想的殘餘。俞先生已經承認了自己的錯誤，並決心進行新我對舊我的鬭爭。我們希望俞先生的新我能够獲得鬭爭的勝利。

解放以來，我們雖然進行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習，進行了思想改造的自我教育，但是我們大部分的人，包含我自己在內，並沒有上昇到能够正確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水平。我們懈怠了對於資產階級唯心論的思想鬭爭，放任了並助長了這種錯誤思想，甚至還成爲了這種錯誤思想的俘虜。等年青一輩的同志們掌握着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武器對這種錯誤思想進行了犀利的批判的時候，我們不僅沒有引起應有的重視，反而壓抑了他們。這就使得問題更加嚴重了。「文藝報」編輯部的同志們已經進行了檢討，文聯主席團和作家協會主席團已經決定，準備妥善地處理「文藝報」所犯的錯誤。

好些朋友在發言中都提到「文藝報」編輯部的錯誤在文藝工作的領導方面也不能沒有責任，我完全同意。我明白認識着我自己應該負的責任就很大。俞平伯先生的「紅樓夢研究」，我一直到現在都還沒有看過。李希凡、藍翎兩位同志的文章是引起了注意之

後我才追看的。「文藝報」和「文學遺產」對於李、藍文章的按語，也是在袁水拍同志發表了質問「文藝報」的文章之後我才追看的。這就充分地表明了我自己在思想鬭爭上的漠不關心。

自己被推選爲文聯主席，對於文聯機關報所犯的錯誤，能够說「事不關己」嗎？能够採取「幸災樂禍」的態度嗎？那是不能够的。「文藝報」所犯的錯誤是我們大家的錯誤，也是我的錯誤。我要感謝領導着我們的黨，領導着我們的黨中央，適時地揭發了我們的錯誤，爲我們撞出了警鐘，使我們在錯誤面前睜開了眼睛。面對着以往的錯誤，我們今後應該怎麼辦？怎麼樣來改正我們的錯誤，補救我們的缺點？這就是擺在我們面前的新問題。

經過四天的集體討論，在怎樣來改正我們的錯誤上，我感覺着我們已經得到了這樣的一些共同認識：

- 第一、我們應該堅決地展開對於資產階級唯心論的思想鬭爭；
 - 第二、我們應該廣泛地展開學術上的自由討論，提倡建設性的批評；
 - 第三、我們應該加緊扶植新生力量。
- 請允許我根據這三點認識來表達一下我自己的意見。

(二)

對於資產階級唯心論的批判是刻不容緩的嚴重的思想鬥爭。買辦資產階級的存在、帝國主義的控制、雖然跟着舊中國的死亡而消滅了，但資產階級唯心論的思想，無論在文藝界或學術界，乃至在我們自己的腦子裡，都還根深蒂固地保持着它的潛在勢力。我們不僅沒有和根推翻它，甚至還時時迴護着它。因此在我們從事文藝實踐或者學術實踐的時候，這種錯誤思想，就每每在不知不覺之間冒出來。

一九五一年我們曾經進行過電影「武訓傳」的批判，那是對資產階級錯誤思想的第一次揭發。在電影「武訓傳」開始放映的當時，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的好些朋友們都沒有看出它的反動性，還曾經加以讚揚。經過那一次的批判，使我們警覺到思想上的毛病，留下了相當深刻的影響。但可惜那一次的批判沒有充分地展開到文化領域的各個方面去，時過境遷，批判的聲浪逐漸沉了，各人的警覺也就逐漸鬆懈了。

目前的關於「紅樓夢」研究的批判是對資產階級錯誤思想的又一次揭發。這一次的情況是怎樣呢？大家是已經熟悉的，我們所犯的錯誤和電影「武訓傳」放映當時所犯的錯誤並沒有兩樣；而且在這一次的錯誤當中却又有新的成分增加，那就是抑制了蓬蓬勃勃的新生力量。錯誤不僅沒有改正，反而有新的滋長。這不就證明資產階級唯心論的思想

是有它的根深蒂固的潛在勢力，我們有不少的人事實上不外是這種錯誤思想的俘虜嗎？中國近三十年來，資產階級唯心論的代表人物就是胡適，這是一般所公認的。胡適在解放前曾經被人稱為「聖人」，稱為「當今孔子」。他受着美帝國主義的扶植，成為了買辦資產階級第一號的代言人。他由學術界、教育界而政界，他和蔣介石兩人一文一武，難弟難兄，倒真是有點像「兩峯對峙，雙水分流」。胡適這個頭等戰爭罪犯的政治生命是死亡了，但他的思想在學術界和教育界的潛在勢力是怎樣呢？電影「武訓傳」和「紅樓夢研究」的思想立場都和胡適的反動思想有密切的關聯。把反封建社會的現實主義的古典傑作「紅樓夢」說成爲個人懺悔的是胡適，把宣揚改良主義的封建社會的忠實奴才武訓崇拜得五體投地的也正是胡適。胡適的影響，胡適所代表的資產階級唯心論的影響，依然有不容忽視的潛在勢力，在這兩次的揭發中不就很具體地表露了出來嗎？

十一月五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王若水同志的「清除胡適的反動哲學遺毒」，扼要地把胡適所信奉的實驗主義的反動性和它的唯心論的本質揭露了，我認爲是值得特別重視的一篇文章。我在這裡只想補充一兩點通俗的說明。

胡適在進行他的研究工作上所販賣的那兩句話，所謂「大胆的假設，小心的求證」，他自己吹噓，這就是科學的方法。好些人一直到今天都還受着這種研究方法的影响。前幾天就有人向我問過：這種方法爲什麼就是唯心論的方法？我的回答是這樣：這是把科

學的研究方法根本歪曲了。科學是允許假設的，科學當然更着重實證。假設是什麼？假設是從不充分的證據所歸納出來的初步的意見。它還不能成為定論，但假如積累了更多的證據或經得起反證，它有成爲定論的可能。所以真正的科學家倒是採取着相反的態度，便是「小心的假設，大胆的反證」。

胡適根本不懂得科學。但他是反動哲學唯心論實驗主義的信奉者，他跟着他的老師美國的實驗主義者的杜威一道，把最基本的科學方法也作了唯心論的歪曲。他大胆地假設一些怪論，再挖空心思去找證據，證實這些怪論。那就是先有成見的牽強附會，我田引水。他的假設就是結論，結果自然只是一些主觀的、片面的、武斷的產物。胡適就是以這樣的方法和態度，否認了屈原的存在，否認了「紅樓夢」的對封建社會的批判，否認了中國文化的價值，否認了中國封建制度的存在，否認了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他曾經主張「全盤西化、全盤接受」。他曾經說過：「被孔丘朱熹牽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馬克思列寧斯大林牽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漢。」他這位自封的「高明」的「好漢」，就是想牽着我們的鼻子走，一同去做花旗順民。我們的鼻子呢？摩一摩看是有點危險的，沒有辦法全盤否認：沒有被這樣一位自封的「好漢」牽着。

其次是杜威所說的「有效即真理」，我認爲，那不外就是「強權即公道」。因爲對資產階級統治者，對帝國主義好戰分子，被認爲最「有效」的就是橫行霸道。那就是杜

勒斯、麥卡錫之流所奉的真理了。此所以實驗主義是最反動的哲學思想，能够在美國吃香。此所以宜揚實驗主義的胡適，不外是美帝國主義的文化走狗。

我完全同意王若水同志的說法：「戰鬪的火力不能不對準資產階級唯心論的頭子胡適」；「認清胡適思想的反動性，清除他的影響，是文化界當前的任務」。

我在這裡要順便報告一項消息。中國科學院和中國作家協會在上星期四已經開過一次聯席會議，通過了一項聯合召開胡適思想批判討論會的計劃。我們擬定了九項內容，分別批判胡適的哲學思想、政治思想、歷史觀點、文學思想和其他有關的問題。每項問題由主要研究人寫成文章，公開報告，並進行討論。我們想用這樣的辦法，把胡適的反動思想在文藝界和學術界的遺毒，加以徹底的清除。我籲請各位朋友注意這件事，請盡力協助，讓我們能够勝利地來完成這項共同的戰鬪任務。

(三)

展開學術上的自由討論，這是一項長期性的工作。這和對資產階級錯誤思想的批判是應該有所區別的。對資產階級錯誤思想的批判，是一項迫切的對敵戰鬪，我們的目的一定要盡可能迅速地把這種錯誤思想肅清，再不能允許它有存在的自由。學術上的自由討論可以說還是在揭發錯誤階段上的不同意見的論爭，經過論爭的結果，由不同之中而

得出同，辨別誰是誰非，以得出一個正確的結論。如果正確的結論一時得不出，儘可以使不同的意見在一定的時期內同時存在。不同意見的同時存在並不一定會引起思想上的混亂，因為矛盾在真理的照明之下總是要得到解決的。我們的任務就是根據真理來促進矛盾的解決。舊的矛盾解決了，新的矛盾又可能產生，又需要在新的情況之下給予解決。這樣蟬聯下去，就使我們的學術水平和文化水平不斷提高。

歷史的事實告訴我們，凡是自由討論的風氣旺盛的時代，學術的發展是蓬蓬勃勃的；反之便看不到學術的進步，連社會的發展也因而停頓了。

在紀元前四世紀至三世紀末期的戰國時代，在中國的文化史上是自由討論最旺盛的時代。那時代的周秦諸子差不多每一位都是雄辯家，都是文章的能手，他們彼此之間的論爭是很激烈的，形成了所謂「百家爭鳴」的情況。因而那個時代在中國文化的發展上也就形成了一個特出的高峰。

在長期停頓的封建社會中，中國歷史上也曾有過好幾次大規模的自由論爭。例如紀元前八一年漢昭帝始元六年的鹽鐵議便是有名的一例。當時漢朝的中央政府召集了天下的開明紳士所謂「賢良」和孔孟之徒的讀書人所謂「文學」六十多位聚集到京城，和御史大夫桑弘羊辯論鹽、鐵和酒的專買政策。從民間來的代表地主和工商業家利益的人們是反對政府所執行的這項政策的，大大地展開了法家思想和儒家思想的一場論爭。論爭

的結果，由於歷史條件的限制，是儒家思想佔了上風。但有了那一次的討論會，却產生了一項值得重視的文化成果，便是桓寬的「鹽鐵論」。桓寬的這部著作被一般人誤解為經濟論文或者會議記錄，其實並不是那樣。那是桓寬在若干年之後的宣帝時代（紀元前七〇年左右）根據會議記錄提煉出來的一部對話式的文學作品。那裡面有典型人物的創造。把六十多位代表地主階級與工商業界的民間代表，概括地抽象成為了所謂「賢良」與所謂「文學」的兩個人。把御史大夫桑弘羊的形象，特別在他的思想方面，刻劃得相當生動。因此，我在這裡要順便向研究古典文學的朋友們請求：請把桓寬的「鹽鐵論」作為寫經濟題材的文學作品處理，在我們講漢文學史的時候，千切不要再忘記了這樣一部最古的現實主義作品的存在。

紀元五八二年至五八八年隋文帝的開皇年間也曾經舉行過大規模的討論音樂的會議。參加討論的人有宰相，有博士，也有音樂奴隸。爭論了七八年，沒有得出什麼結論。但那一次的討論會，毫無疑問，是促進了隋唐兩代的高度的音樂文化的。

歷史上的引證太多了，說來使得大家沉悶，我不準備多說了。但我要請大家回憶一下在解放前五四運動以來的文化活動的近狀。在那短短的三十年的期間曾經有過不少次的激烈的論爭，有時是對敵的戰鬪的。戰鬪和論爭的成就是怎樣呢？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一九四二年五月）中已經說過：「五四以來，這支文化軍隊就在